

◀（上接 6 版）

国家重点文物 800 多件。

“张先生当年拍的很多都是一级、二级文物。”陈绍棣说，张先生对文物的成像要求很高，一般都亲自从照相机观测镜上查看效果，待光圈、焦距、速度调整到最佳效果才点头，此时摄影师方可按动快门。“张先生对文物拍照技术很有钻研，对每件文物的形态、每个细节都不放过。这些照片张张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！”

安守仁在回忆录中写道，1960 至 1964 年，张先生率领图谱组人员携带照相器材，前往陕西、河南、山西、内蒙古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上海、山东、安徽、广东、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等 17 个省市及有关县市，拍摄、收集文物照片近 7000 张。为了陪摄影师冲洗胶片，已年过半百的张先生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。当时已是学术大家的张先生，在出差时常常以糠代粮，坐“闷罐子”车，住普通职工宿舍，令旁人肃然起敬。

陈绍棣说，张先生除了带领大家拍摄、翻拍文物照片，还从中国书店选购了不少珍贵书籍、名人信札、图册、画册、碑帖等，为《图谱》提供了宝贵资料。

令人痛心的第一次“下马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记得，1964 年 9 月初，包括他和陈绍棣在内的 4 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 1963 年已更名为“物质文化史组”的图谱组工作，陈绍棣和他与张先生 3 个人在一间小办公室内一起做《图谱》。没想到，当年 10 月“四清”运动就波及到了他们。“才忙了一个月，我们的工作就被迫停止了。”栾成显说，没多久“文革”随之而来，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干扰，图谱组人员流散，《图谱》编纂项目遭遇第一次“下马”。

据安守仁生前回忆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历史所是重灾区。最令人心痛的是，已经整理好的大量《图谱》相关图书资料散失，文物照片散乱，照相器材被收统管，“历史所的学者们终日不得安宁地度过了 10 年”。尤其是 1969 年 1 月，工人、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历史所后，为了解决住地和“办公”用房，在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，他们将所里收集、整理的书籍、信札、图册、碑拓、册页胡乱搬走。后来，又以“战备转移”为由，将张先生及图谱组之前辛辛苦苦从全国 10 多个省收集到的文物资料底片、照片，胡装乱塞入战备箱运往湖北、陕西等

地。直到 1973 年初，这批图书资料才被运回北京。但开箱后，安守仁直接“傻了眼”——图谱组的主要文物照片、底片、登记目录竟然都不在箱内！在责任感的驱使下，安守仁“记不清经过多少艰困”，才寻回了这些重要物资。

二度“上马”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197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。1978 年前后，《图谱》编纂工作再次“上马”，仍由张政烺先生担任主编。张先生重新调整了编写大纲，二度“上马”的《图谱》由 10 卷 14 册构成。

当时历史所古文献研究室分为 2 个组，一个是“图谱组”，另一个是“文献组”。除了 5 名老成员，张先生又“招兵买马”了一些新人加入图谱组。

黄正建是“文革”后社科院历史所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，1981 年毕业后进入历史所，和另外 3 名新人一起被分配到图谱组工作。他负责《隋唐五代卷》的编写，在他的印象中，这一时期的《图谱》编写是有章可循的，张先生重新拟定了编辑体例，对《图谱》的说明文字、图片选择、版式版样等，提出了相当具体且有可操作性的要求。

就说明文字而言，张先生拟定了详尽的文字体例。比如，对于每一卷的概述文字规定了内容和字数，“每卷以图版为主，前为概述，略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，以及重要文物保存或发现情况，尽量吸取史学界的新成果。字数一万字”；比如，对于照片的归类和放置，他提出“将文物按历史性质以类相从，并在每类之前作出分类（专题）说明，字数以四百至一千为宜”；比如，具体器物的图片说明与概述文字要如何区隔，他建议“高层次的内容（如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）放在概述里讲，低层次的内容（如陶瓷、漆器、瓷器）放在分类说明里讲。抽象的东西放在概述里写，具体的东西放在分类说明里写”；比如，对于文物说明的体例，他规定“每件文物的说明包括以下几点，即名称、时代、出土地点、收藏单位、尺寸、质地、形制、历史价值。实事求是，宁缺毋滥。每篇约一百至五百字”；以及，“每卷之末列参考文献目录，统编号码，概述及说明中如果征引或使用，只注号码”。黄正建说，这一严谨的体例反映了张先生对《图谱》内容与形式如何结合的深思熟虑，一直为此后的实际编纂工作所遵循。

对于图片，张先生提出，图片范围包括古文物、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籍、古地图、古画等。挑选图片，以历史价值为主，艺术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泽咸、王曾瑜（中）、张政烺先生（右）在张先生家。时张先生已患病，挪动身体不便，张师母傅学苓先生要求大家不拘礼节，便坐沙发合影留念。
王曾瑜供图

价值次之。每一册书选定四五百张图，考虑到总体成本，规定彩色图片不超过所有图片的四分之一。为了更便利地获取图片，张先生专门向所里申请引进了一位做翻拍工作的摄影师，并布置了一间暗房。所有编写者要将当时能看到的文物考古类杂志，从创刊号一直翻阅到编写时的最近一期，并翻看许多图录，而后挑选文物，制作卡片，并将卡片上提到的文物交摄影师翻拍出小样。

黄正建说，张先生还要求所有编写者将小样分类排好：每个人都以一页为一个图版，在一页中收入一至若干张图片，自己选择合适的方式排版，并顺序写上图版号、图片号、器物名称等，还要单独写图片说明的文字稿。

当每位编写者的桌上都堆起厚厚的一摞小样时，《图谱》的初稿就差不多完成了，那是《图谱》二度“上马”10 年后的 1989 年。“稿子和图片小样送到主编张政烺先生家时，先生很高兴，难得地与我闲谈了一阵。”黄正建说。

轰动的撤项

黄正建记得，到了 1990 年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原本答应出版《图谱》的出版社撤项，导致《图谱》工作不得不停止。

直到 1991 年 9 月，图谱组再度恢复工作。黄正建在日记中记到：“9 月 3 日：师勤（时为图谱组资料员）通知星期五开会，图谱又要上马。”到了 1992 年 2 月，某地方出版社表达了对《图谱》的兴趣，派了包括副社长在内的 4 人到所里与编者们座谈。1994 年 7 月至 1995 年 6 月，时断时续的《图谱》编写工作终于持续进行。当时，无论是酷暑还是下雪天，甚至过年在家期间，编写者们都在为《图谱》赶工，增加新出的文物图片。1995 至 1996 年期间，不少人再度完成了文字稿和图片小样。

不过，那时候的学术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由于《图谱》

的图片多是从各种公开出版的考古文物图书中进行挑选，而当时人们已经有了“版权”意识，这个新问题很快成了大问题。

由于版权问题涉及面太广，令这家地方出版社和图谱组都无法招架。1995 年 11 月 29 日，黄正建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图谱出版也基本无望……”他告诉记者，当时这家出版社已经投入了不小的成本，为印刷图片专门购置了四色套色的印刷机器。为了保证书本质量，所领导和几名图谱组组员也好几次前往当地，与出版社商议编辑、出版事宜。出版社的放弃，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。在日记中，黄正建写道：“得知图谱不出了……此事颇让我伤心……”

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。由于解决不了版权问题，也找不到新的出版社接手印刷发行，1996 年 7 月，图谱被正式从“国家项目”中撤项，又一次“下马”了。

一部初稿基本完成、史学界众多名家参与编写的大部头图书被撤项，此事很快登上了 1996 年 7 月 30 日（第 16 期）《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》头版，在学术圈引起了很大震动。

“绝不能再‘下马’”

直到今天，王曾瑜的脑中仍不时浮现一个场景：1996 年的夏天，张政烺先生把自己闷在书房里，兀自望着窗台上一叠用报纸包起来的東西出神。连着好几日，他都这么坐着，一坐就是半天。“后来，师母傅学苓先生同我讲，她翻开来看过，那叠报纸包着的是《图谱》原始社会部分的手稿。”说完，王曾瑜重重地叹了口气，“撤项对张先生的打击非常大。从那以后，他的精神状态一落千丈，身体也大不如前。”

王曾瑜告诉记者，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，曾受教于张先生。在他看来，自年轻时就被称为“小王国维”的张政烺先生学识极其渊博，在与其同辈的优秀史家中，也是出类拔萃者。

尤令他敬佩的是，张先生博览群书，治史不分断代，对中国考古学、古文字、版本目录等均有精深的造诣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华书局请学者点校“二十四史”时，张先生被分配到点校《金史》，“拿来就点”，甚至还用古医书纠正了《金史》中的差错之处。王曾瑜至今记得，1991 年过春节时，张先生请他到家中做客，提出希望由他执笔写作《张政烺先生学术传记》，编入组稿中的张先生 80 华诞祝寿文集，这令他倍感荣幸。当读到张先生 1998 年的自述文章：“一九五八年我开始从事主编《中国历史图集》的工作。我倾注全力，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，可惜由于种种原因，断断续续，虽降格以求，也终须放弃。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，是此生一大遗憾！”（摘自朱凤瀚整理、张政烺自述《我与古文字学》）王曾瑜心里很难过。他认为，张先生一生都在为别人付出，却一直未能将自己的大部分学问付梓，这不仅不是他的最大损失和遗憾，也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，“张先生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师，我就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事”。

黄正建记得，2000 年王曾瑜找他谈《图谱》之事时，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了起来，“王先生对张先生有一种责任感”。在当天日记中，黄正建这样写道：“我既想让图谱出来，又怕再耽误几年，也是很矛盾。”在他看来，曾经参与编辑《图谱》的学者，不少都有类似的心态。

王曾瑜告诉记者，考虑到自己在院里有一定的影响，2001 年他以张先生和自己的名义，向中国社科院申请了重点科研项目，酝酿让《图谱》“起死回生”。但因出版资金没有着落，图谱组成员流失严重，虽然申请报告改了又改，工作迟迟却不能开展。

直到 2004 年，这一课题申请才得到批复，经费和出版社也有了眉目。在关树东、黄正建等人的努力下，经历了一次次

（下转 8 版）▶